

# 欧美国家宗教文化与储蓄率差异研究

## ——来自 OECD 国家的证据

路继业 张 冲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 利用 1975–2013 年 19 个 OECD 国家的面板数据,把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从而将文化引入储蓄率决定方程,考察文化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文化对国民储蓄率确实有显著影响,并且不同文化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不同;新教国家平均国民储蓄率高于 19 个 OECD 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水平,天主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与这一水平基本持平,而伊斯兰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显著地低于这一水平;总体而言,新教对国民储蓄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伊斯兰教对国民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 文化;储蓄率;宗教;全面 FGLS 估计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7.01.003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7)01–0023–06

### 一、引言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关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不断涌现,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也成为研究重点。很多研究探讨了文化和经济增长(李娟伟等,2016<sup>[1]</sup>、叶德珠等,2016<sup>[2]</sup>)、文化和企业治理(阮荣平等,2014<sup>[3]</sup>、雷光勇等,2016<sup>[4]</sup>)以及文化和居民福利(郭君平等,2016<sup>[5]</sup>)之间的关系,但是关于文化和储蓄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一直较少。传统的储蓄决定理论认为,储蓄率主要受经济增长率、人口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而未将文化考虑在内。而现实中的很多事实却说明也许文化和储蓄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很多经验事实,以及传统因素的解释力较低等原因,使得一些人认为是文化因素影响了人们的储蓄率决定。Bosworth (1993)对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的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如人口因

素、收入增长率、社会保障系统、税收系统、住房价格等进行了验证,然而结果却表明,除了收入增长率以外,其他的变量对不同国家的储蓄率仅有很小的解释力<sup>[6]</sup>。因为没有发现一个满意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变量,因此,他将未能解释的储蓄率差异归因于文化的影响,即国家之间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储蓄率的较大差异。Christopher 等人(1994,1998)以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国的人的储蓄行为为代理变量,通过比较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移民的储蓄行为,对 Bosworth(1993)的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却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文化因素会影响储蓄行为。当然,文中也指出了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的原因:数据问题(小样本)和方法问题(以移民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是否合适)<sup>[7][8]</sup>。确实,移民一般来说都是一国之内的精英阶层,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财富水平,同时移民容易受到移民国文化的同化,而改变其原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和难点:风险分析、控制系统和激励机制”(项目编号:12&ZD06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管制放松进程中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研究:基于政策可信性的视角”(项目编号:71403042)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资本管制放松进程中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研究:基于政策可信性的视角”(项目编号:14YJC79008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路继业(1979–),男,河南洛阳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有的文化特征,因此以移民作为代理变量有失偏颇。在一篇解释中国储蓄率谜题的文章中,Modigliani (2004)批判了中国高储蓄率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观点,他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储蓄率水平很低,这不是文化因素所能解释的<sup>[9]</sup>。但是Modigliani (2004)的这种仅利用特定时期内储蓄率所表现出的特定现象就做出否定文化因素对储蓄率影响的做法涉嫌以偏概全,也不能让人信服。叶德珠等(2012)利用儒家文化哑变量和性生活指数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得出消费文化等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因素比传统变量更能解释各国居民的消费差异的结论<sup>[10]</sup>。叶德珠(2015)运用Hofstede文化指数和“优势分析”方法对文化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验证了文化对储蓄率国别差异的较强解释力<sup>[11]</sup>。

除了关于文化和储蓄率的直接文献外,我们还可以从研究文化和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发现文化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Weber (1905)在其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写到“当消费的限制和获利活动的解禁相结合,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来实现资本积累……在这个严谨的加尔文主义只统治了七年的国家(荷兰)里,越是严谨的宗教圈子,其生活方式就越节俭……与此同时,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为这些资产阶级商人提供了严谨、尽责又极为勤勉的工人,这些工人将工作视为上帝安排给他们的人生目标。”<sup>[12]</sup>总之,Weber指出,新教伦理所蕴含的这种节俭和勤勉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对Weber的观点进行了验证,McCleary & Barro (2006)以教堂出勤率和信仰作为宗教(文化)的代理变量,对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验证,得出信仰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而教堂出勤率则对经济增长有负向的影响的结论<sup>[13]</sup>。Marcus (2005)用虚拟变量法引入不同的宗教,并运用多国数据进行验证,亦否定了宗教和经济绩效不相关的假设,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太稳健<sup>[14]</sup>。邹恒甫(1993)论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节俭观在实践中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提高一国的储蓄率,带来长期的经济增

长<sup>[15]</sup>。Gernot 等人(2000)和Cavalcanti 等人(2007)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这些文献都提到文化会通过影响人的特性,如诚实、节约、勤俭等来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sup>[16][17]</sup>。也就是说,文化会通过以下路径对经济产生影响:文化——储蓄率——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但是,在这个路径中,文化对储蓄率的传导很少有文献进行实证研究,少量的研究亦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由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代理变量的选择对于研究结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一个更为合适的文化代理变量,对于研究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为了更加科学地选择文化的代理变量,我们需要首先对文化进行界定。费孝通(1946)指出文化定义应包含三个层次,即: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器物层次、社会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价值观念层次(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价值观念集合)<sup>[18]</sup>。可以看出宗教是文化在社会组织层次和价值观念层次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通过社会组织和价值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很多学者处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仅选取其中的部分因素作为文化的代表。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性,又因为在研究文化和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大多数都是从宗教方面来考虑的,所以我们选定宗教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

我们参照Marcus (2005)、叶德珠(2012)的做法,利用虚拟变量,将基督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引入储蓄决定方程中,以考察以宗教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对欧美国家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实证分析验证了文化因素对人们储蓄行为的影响,为“文化影响储蓄”这一假说提供了另一个理论支持;二是将欧美国家数据按宗教信仰进行分类,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宗教信仰国家的储蓄行为,并得出了宗教信仰会影响储蓄行为的结论。

## 二、数据说明、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 (一) 数据说明

考虑到亚洲很多国家无宗教信仰或者国内宗教过多而不能找到一个主流的宗教,本文只选择了OECD国家中的19个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本文

模型所涉及的数据涵盖了 19 个国家从 1975–2013 年的时间跨度。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些国家可以以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为标准分为三类,其中,新教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新西兰、挪威、瑞典、英国和美国,天主教国家包括奥地利、智利、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墨西哥、葡萄

牙和西班牙,伊斯兰教国家是土耳其<sup>①</sup>。国民储蓄率、GDP 增长率、人均 GDP、通货膨胀和预期寿命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而关于人口结构的数据(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自于 OECD 数据库。其中数据少量缺失的部分,由插值法计算补全。表 1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变量名	简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民储蓄率	SR	741	21.91	4.85	1.48	40.50
新教虚拟变量	PRO	741	0.53	0.50	0.00	1.00
天主教虚拟变量	CAT	741	0.42	0.49	0.00	1.00
伊斯兰教虚拟变量	ISL	741	0.05	0.22	0.00	1.00
GDP 增长率	RGDP	741	2.71	2.87	11.36	12.28
人均 GDP	LNGDP	741	9.60	0.96	6.54	11.54
通货膨胀率	INFL	741	10.52	21.98	5.20	334.65
预期寿命	EXPL	741	76.16	4.14	55.46	83.15
少年抚养比	YDEP	741	22.35	6.03	13.78	45.58
老年抚养比	ODEP	741	12.60	3.85	3.98	20.81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上面的说明,本文以宗教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将其纳入储蓄决定方程,得到基本面板回归方程为:

$$SR_{it} = \alpha + \beta_1 Rel_{it} + \sum \gamma_i X_{it} + \varepsilon_i + \mu_{it} \tag{1}$$

其中 i 表示国家,t 表示时间,SR<sub>it</sub>表示国家 i 在时间 t 时的国民储蓄率,Rel<sub>it</sub>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宗教虚拟变量,X<sub>it</sub>是各种控制变量,ε<sub>i</sub> 是表示观察不到的地区效应,μ<sub>it</sub>是随机扰动项。

具体来说,SR<sub>it</sub>是国民储蓄率,它等于国民总储蓄比上 GDP,其中国民总储蓄等于总居民收入减去总消费加上转移支付。

宗教虚拟变量 Rel<sub>it</sub> 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三个因素,分别用 PRO、CAT 和 ISL 来表示。其中,PRO 表示新教国家为 1,其他国家为 0;CAT 表示天主教国家为 1,其他国家为 0;ISL 表示伊斯兰教国家为 1,其他国家为 0。其中,我们分别以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为基准变量,分别作了回归分析。

X<sub>it</sub>是控制变量或者是其他解释变量,综合 Franco Modigliani (1966,1970) 和 Horioka C Y (2012) 等人的研究<sup>[19][20][21]</sup>,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以下四类:(1)经济增长变量;(2)居民收入变量;(3)人口变量;(4)通货膨胀指标。其中,经济增长变量用 GDP 增长率(RGDP)表示;居民收入变量本应用实际居民人均收入,但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我们用人均

GDP 来做代替,并对其作对数处理,记为 LNGDP;人口因素包括出生率(FR)、预期寿命(EXPL)、少年抚养比(YDEP)和老年抚养比(ODEP),其中,少年抚养比是指未成年人口(0–14 岁)与工作人口(15–64 岁)之间的比例,老年抚养比是指老年人口(65 以上)与工作人口之间的比例;通货膨胀指标即通货膨胀,用 INFL 来表示,同样考虑数据可得性,这里我们用 GDP 平减指数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

(三)估计方法

对于长面板数据而言,传统的处理短面板数据的方法,如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等并不能得到一致估计量,且估计效率有所下降,已不适用。又因为长面板数据的时间维度 T 大于个体维度 N,所蕴含的信息较多,扰动项可能会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就模型(1)而言,假设其个体扰动项 μ<sub>it</sub> 的方差为 σ<sub>i</sub><sup>2</sup>≡Var(μ<sub>it</sub>),如果 σ<sub>i</sub><sup>2</sup>≠σ<sub>j</sub><sup>2</sup>(i≠j),则扰动项存在着组间异方差;如果存在 Cov(μ<sub>it</sub>, μ<sub>is</sub>)≠0(t≠s, ∀ i),则称扰动项 μ<sub>it</sub>存在着组内自相关;如果存在 Cov(μ<sub>it</sub>, μ<sub>jt</sub>)≠0(i≠j, ∀ t),则称扰动项 μ<sub>it</sub>存在着截面相关<sup>②</sup>。为此,我们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处理:一是对于组间异方差和截面相关,使用 OLS 方法来估计,同时用误差标准误进行校正,简称为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二是对于以上这三个问题,直接使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相比较这两种估计方法,“OLS+面板校正标准误”法更



为稳健,全面 FGLS 更为有效率。

Greene(2000)提供了对组间异方差的沃尔德检验和对组间同期相关的 Breusch-Pagan LM 检验,而 Wooldridge(2002)提供了一个对组内自相关的沃尔德检验<sup>③</sup>,分别使用 Stata 的 xttest3、xtserial 和 xttest2 对这三种情况进行了检验,检验的原假设及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 异方差及自相关检验			
检验	原假设	P 值	结论
组间异方差检验	不存在组间异方差	0.000	拒绝
组内自相关检验	不存在组内自相关	0.000	拒绝
组间同期相关检验	不存在同期相关	0.000	拒绝

由表 2 可以看出,不论是组间异方差检验、组内自相关检验,还是组间同期相关检验,由 P 值可以看出,结果都是强烈地拒绝原假设,即数据存在着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自相关。鉴于这种情况,本文使用“OLS+面板校正标准误”和全面 FGLS 方法进行估计。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我们分别以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为基准变量,将宗教信仰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储蓄决定方程,对数据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虽然 R<sup>2</sup>比较低,但是除了 FGLS2 中新教前面的系数边际显著外,其他系数都十分显著。由联合显著检验 Word 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是十分显著的。

表 3 面板估计结果				
自变量	PCSE1	PCSE2	FGLS1	FGLS2
PRO	5.33 *** (7.22)	0.82 *** (2.86)	4.84 ** (2.22)	0.80 (1.33)
CAT	4.51 *** (8.26)		4.04 * (1.79)	
ISL		-4.51 *** (-8.26)		-4.04 * (1.79)
常数项	17.2 *** (28.72)	21.71 *** (95.21)	17.73 *** (8.21)	21.77 *** (46.83)
R <sup>2</sup>	0.06	0.06		
Word 检验	0.000	0.000	0.036	0.036
面板描述	N = 19, T = 39 观测值:741	N = 19, T = 39 观测值:741	N = 19, T = 39 观测值:741	N = 19, T = 39 观测值:741

注:所用的软件包是 Stata13.0,表格括号中报告的是 t 值,在 PCSE 估计中,我们使用的是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计算得到的 t 值,\*、\*\*、\*\*\* 分别代表的是在 10%、5%和 1%置信水平上显著。

具体来说,由第一个估计方程 PCSE1 可以看出,基准组伊斯兰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为 17.

2%,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均显著的高于伊斯兰教国家,分别是 22.53%和 21.71%,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新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比天主教国家高 0.82%,比伊斯兰教国家高 5.33%。与平均储蓄率 21.91%相比较,新教国家的国民储蓄率要高于平均储蓄率 0.6 个百分点,天主教国家的国民储蓄率与其基本持平,而伊斯兰教国家则显著的低于这一水平。由第三个估计方程 FGLS1 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国家、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分别是 17.73%、21.77%和 22.57%,与第一个估计方程结果基本相同。为了验证以上结果,我们又以天主教国家为基准变量,对数据进行了回归(即方程 PCSE2 和 FGLS2),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这两个方程与方程 PCSE1 和 FGLS1 结果相同。因此我们得出,新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比天主教国家高 0.8%左右,比伊斯兰教国家高 5%左右。新教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国民储蓄率高于平均水平,天主教国家则与平均水平持平,而伊斯兰教国家显著低于这一水平。

表 4 面板估计结果稳健性检验				
自变量	PCSE1_1	PCSE1_2	FGLS1_1	FGLS1_2
PRO	5.39 *** (6.28)	0.03 (0.12)	5.58 *** (3.06)	0.52 (1.21)
CAT	5.35 *** (6.85)		5.06 *** (2.73)	
ISL		-5.35 *** (-6.85)		-5.06 *** (-2.73)
RGDP	0.46 *** (7.00)	0.46 *** (7.00)	0.23 *** (15.23)	0.23 *** (15.23)
LNGDP	1.61 *** (3.71)	1.61 *** (3.71)	0.95 *** (3.09)	0.95 *** (3.09)
INFL	0.03 ** (2.34)	0.03 ** (2.34)	0.03 *** (5.72)	0.03 *** (5.72)
EXPL	-0.42 *** (-5.02)	-0.42 *** (-5.02)	-0.24 *** (-2.94)	-0.24 *** (-2.94)
YDEP	0.01 (0.15)	0.01 (0.15)	-0.01 (-0.11)	-0.01 (-0.11)
ODEP	0.42 *** (4.47)	0.42 *** (4.47)	0.28 *** (3.45)	0.28 *** (3.45)
常数项	26.19 *** (4.57)	31.54 *** (5.3)	21.42 *** (3.31)	26.48 *** (3.97)
R <sup>2</sup>	0.19	0.19		
Word 检验	0.000	0.000	0.000	0.000
面板描述	N = 19, T = 39 观测值:741	N = 19, T = 39 观测值:741	N = 19, T = 39 观测值:741	N = 19, T = 39 观测值:741

注:所用的软件包是 Stata13.0,表格括号中报告的是 t 值,在 PCSE 估计中,我们使用的是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计算得到的 t 值,\*、\*\*、\*\*\* 分别代表的是在 10%、5%和 1%置信水平上显著。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加入了 GDP 增长率、人均 GDP、通货膨胀率、预期寿命、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六个控制变量,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以看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除了 PCSE2 中新教前面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以外,其他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并没有发生变化,而由 Word 联合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方程整体是显著的。不同的是,再加入控制变量以后,新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均比伊斯兰教国家高出 5.4%-5.6%,比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有所增加;新教和天主教对储蓄率的影响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弱,由 0.8%下降到 0.5%左右,但新教对储蓄率的影响依旧是要超过天主教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确实对国民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就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三个宗教而言,新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稍高于天主教国家,而两者的平均国民储蓄率水平都显著地高于伊斯兰教国家;与平均国民储蓄率相比,天主教国家基本与其持平,新教国家稍高,而伊斯兰教国家显著低于这一水平。也就是说,新教对储蓄率有正向影响,而伊斯兰教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

我们试图对这一结果进行阐释。新教和天主教都属于基督教范畴,因此,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储蓄率水平相似。虽然基督教是主张“入世”的宗教,其发展一直和世俗社会联系在一起,但不同的是,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教导信徒通过苦身修行来使灵魂得到拯救,更加注重精神追求;新教的禁欲主义恰恰相反,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以证明自己是上帝救赎的对象,而恪尽职守的表现则是进取心和节俭。正是新教伦理中的这种勤奋、节俭的精神提高了人均收入和储蓄率,使得新教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储蓄率水平超过了天主教国家。而相对于这两者,伊斯兰教更多是为政治统治服务,而且也更加保守,虽然也强调简朴的生活和高尚的品德,但是由于这种文化而带来的法律不健全、基础设施较差、经济增速较慢等致使储蓄率较低。但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国民储蓄率与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差距是否为本文的 4%-5%,并不能够确定。限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本文中的伊斯兰国家只包含土耳其一个国家,若有更多国家的

数据加入,结果可能会更加合理。

#### 四、结论和不足

本文将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将文化引入储蓄率决定方程,利用 1975-2013 年 19 个 OECD 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文化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我们通过 PCSE 和全面 FGLS 两种估计方法对数据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显示:文化对国民储蓄率确实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不同文化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不同。第一,以新教为主流的国家平均国民储蓄率稍高于以天主教为主流的平均国民储蓄率,两者都显著地高于以伊斯兰教为主流的国家;第二,新教国家的平均国民储蓄率高于平均国民储蓄率,天主教国家的平均储蓄率与这一水平基本持平,而伊斯兰教国家显著的低于这一水平,也就是说,新教对储蓄率有正向影响,而伊斯兰教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文章充分地考虑了面板数据所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并且加入了多个控制变量,检验结果显示,我们的研究结果依然基本稳健。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第一,对文化代理变量的处理过于简单。本研究仅利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将宗教引入储蓄率决定方程,对文化代理变量的处理相对简单,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可以量化的代理变量,那研究会更加完善。第二,本文仅进行了静态识别,而未涉及动态识别部分。由于宗教虚拟变量是不变时间序列,并没有一种合适的估计方法进行动态估计,因此,本研究并未涉及动态识别。

#### 【注】

①很明显一些国家是多宗教国家,但是其中某个宗教占主流,因此我们将其划为以这个宗教占主导的国家之中。比如美国,1975 年美国新教占人口的比例为 62%,到 2012 年下降到 48%,但远超天主教占比的 22%,因此本文认为美国是新教国家。

②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72.

③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79-282.

#### 参考文献:

[1]李娟伟,任保平,刚翠翠.文化资本异质性能够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吗?——来自30个省区面板数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03):24-31.

[2]叶德珠,师树兴.文化与经济增长[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74-83.

[3]阮荣平,郑风田,刘力.信仰的力量:宗教有利于创业吗?[J].经济研究,2014,(03):171-184.

[4]雷光勇,刘茉,曹雅丽.宗教信仰、政治身份与企业投资偏好[J].财经研究,2016,(06):110-120.

[5]郭君平,张斌,吴国宝.宗教信仰、宗教参与影响农民主观贫困和福利吗?——来自全国5省1000个农户调查的证据[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03):14-24.

[6]Bosworth B. 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M]. Brookings Inst Press, 1993.174-179

[7]Carroll C D, Rhee B K, Rhee C. Are there cultural effects on saving? Some cross-sectional evidenc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685-699.

[8]Carroll C, Rhee B K, Rhee C. Does cultural origin affect saving behavior? [J]. 1998.

[9]Modigliani F, Cao S L.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145-170.

[10]叶德珠,连玉君,黄有光等.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J].经济研究,2012,(02):80-92.

[11]叶德珠,连玉君,黄有光.文化与储蓄:基于优势分析的跨国实证研究[J].金融评论,2015,(03):31-44.

[1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4-

178.

[13]McCleary R M, Barro R J. Religion and economy[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49-72.

[14]Noland M. Relig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8): 1215-1232.

[15]邹恒甫.积累欲,节俭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 1993,(02):56-64.

[16]Doppelhofer G, Miller R I, Sala-i-Martin X. Determinants of long-term growth: A Bayesian averaging of classical estimates (BACE) approach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0.

[17]Cavalcanti T V, Parente S L, Zhao R. Religion in macroeconomic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Weber's thesis [J]. Economic Theory, 2007, 32(1): 105-123.

[18]蔡旺春.文化与经济增长文献述评[J].科学.经济.社会,2010,(02):173-177.

[19]Modigliani F.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the demand for wealth and the supply of capital [J]. Social Research, 1966: 160-217.

[20]Modigliani F.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and inter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saving ratio [J]. Induction, growth and trade, 1970: 197-225.

[21]Horioka C Y, Terada-Hagiwara A. The determinants and long-term projections of saving rates in developing Asia [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12, 24(2): 128-137.

(责任编辑:杨 磊)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ccidental Countries' Religious Culture and Savings Rate  
——The Evidence from the OECD Countries

LU Jiye,ZHANG C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Abstract:** Putting religion as a proxy variable of culture and introducing culture into saving decision equ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s of cultural factors on saving rates using panel data of 19 countries belong to OECD for the period 1975-2013.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culture do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national saving rates, an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ultures on national saving rates is different. The average national saving rate of Protestant countries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national saving rate of OECD, the average rate of Catholic countries was basically flat with that level, while Islamic countries significantly lie under this level. That is to say, Protestant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saving rates, while Islam has negative impact on saving rates.

**Key Words:** Culture; Saving rates; Religion; Comprehensive FGLS estimation